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七八年

53

3

4

译者前言

十三世纪蒙古封建统治者与西藏僧俗上层开始发生连系，是我国民族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它直接导致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西藏直辖于中央的基础，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刊登在这一期上的四篇译文都是环绕这个事件及其继起的史实或作综合的叙述或作详密的考证的。由于汉文有关文献不足，这些文章所引用援据的大量藏文蒙文史料，就提供了参考的便利。冈田英弘一文勘比史料的异同以求确证，怀利一文着眼于蒙古政治军事战略全局以澄清事实，均有所沟通发明，不无可取之处。

但是在这几篇文章里都出现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提法，反映出外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政治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罗利赫。列里赫文发表于1958、1959年，正当他得赫鲁晓夫同意从印度返回苏联后不久。文章形式上似乎依据史料就蒙藏关系史作一概述，实际上往往肆意歪曲事实，鼓吹所谓“施主——法师”关系一类蒙藏封建僧侣上层用以掩盖臣属地位的谰辞，变本加厉、荒唐无稽地把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服属关系说成“平等国家”之间的“缔约关系”，挖空心思否定历代中央在西藏行使主权的史实，其用心显然是为苏修叛徒集团分裂我国的反动政策捏造根据。在史料的运用和解释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希望读者注意并给予批驳和纠正。

• 本文系邓锐龄同志执笔，经王森先生审阅。

目 录

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 [美] 怀利

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关系..... [日] 冈田英弘

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藏关系..... [苏] Ю. Н. 罗利赫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蒙藏关系..... [苏] Ю. Н. 罗利赫



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

〔美〕怀利 (Turrell V. Wylie) 著

吐蕃帝国因九世纪王系分裂，土崩瓦解。山河破碎，政权分散，酋豪力兢，互不统摄，凡数百年。然后，在十三世纪蒙古首次侵入西藏，由此引起一系列事件，将世俗政权同宗教的教阶制度连结起来。这个僧俗势力相依为命的胚胎，又经过数百年的演进，终于在“喇嘛之国”形成了一种神权政体。蒙古入藏一事，性质这样重要，可是，也许没有其它事件在西藏历史上记载得如此年代紊乱，使人困惑。关于蒙古征服其它国家的经过，目前有许多史料可供使用⁽¹⁾。不幸，关于征服西藏的记述则是寥寥数笔，仅具轮廓。藏文材料本身不外事后的追记，并且蒙染了宗教色彩，后来“撰述历史的喇嘛们”用一种宗教因果观把零散的事件加以贯连解释，这种观点时时隐伏在材料之中。在这样的史料里，史实依据本来已经像谜语一般地费解，而且讹谬层出，加以近人研究的论著，弄得更加混乱，于是，蒙古征服西藏一事的真相竟被歪曲。本文不拟对这次征服事件作一次确定的研究，只想再次汇集习见的记载，使这一史实呈现为一幅年代不紊因果分明的清晰的图画⁽²⁾。

为了读者方便，现在把若干史料中关于“传统的”十三世纪蒙藏关系的记述，提要如下：

1206年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诸部之大汗，于是策划入侵西藏，西藏当地领主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了一次会议，1207年派出一个使团向大汗投降。此后和平延续了几十年。1227年成吉思汗卒，藏人停止入贡；结果1240年皇子阔端派军远征以示惩罚。多达达尔汗

(Doorda Darkhan) 等率军自青海地区 (Kokonor region) 出发, 兵锋直指中部西藏, 将热振寺 (Rwa-Sgremg) 及杰拉康寺 (Rgyal-lha-Khang) 付之一炬, 约五百人被蒙古所杀。既而蒙军帮助修复烧毁的寺院, 次年撤退北返, 多达达尔汗奉命访求一位学识精邃的喇嘛以传教于蒙古, 乃推荐统治萨迦地方, 出身于款氏 ('Khon) 名门的一位著名喇嘛, 于是萨迦班智达 (Sa-skya pandit) 在1244年被延请到皇子阔端在青海地区的营帐。萨迦班智达 (译者注: 以下简作萨班) 指定释迦桑波 (Shākya Bzang-po) 掌办萨迦事务, 携带两侄即八思巴和恰那多吉 (Phyag-na rdo-rje) 向青海出发。1247年阔端与萨班会晤, 授萨班以蒙古代表的名义全权统治西藏。萨班遂致函于西藏当地首领, 呼吁他们投降并入贡于蒙古。1251年萨班与皇子阔端同年殁落, 贡礼遂绝, 次年蒙古军再次入藏。1253年, 忽必烈封萨班的长侄八思巴喇嘛 ('Phags-pa Lama) 为“国师”, 授予管辖乌思藏十三万户的世俗权力, 为了牵掣平衡, 另外又指定一名行政长官, 驻在萨迦, 监临摄政。第一任行政长官即释迦桑波。在忽必烈1260年践蒙古可汗大位以后, 赐八思巴以“帝师”封号。1265年八思巴去萨迦一次, 迨返大都, 献上他设计的一种蒙文字母。1269年大汗下诏颁布这种难写繁琐的八思巴字母, 用于官方文书。1276年八思巴重返萨迦, 四年后死在当地。止贡派 ('Bri-khung) 领袖早在1267年即依附旭烈兀 (忽必烈弟、波斯的伊儿汗朝始祖), 八思巴卒后不久即叛萨迦。止贡叛军及倾向波斯的蒙古被萨迦及忽必烈子铁木儿不花 (Temürbukha) 率领下的联军击败, 胜利的军队进抵止贡寺院中心并焚毁之, 事在1290年。1294年, 萨迦僧侣统治集团的最大的保护人忽必烈可汗逝世。萨迦在西藏代表蒙古摄政, 其超越侪辈之上的地位, 原来全靠着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 在十四世纪中叶, 这个摄政体制被十三万户中的一员万户推翻, 是时, 在中国的蒙古统治也摇摇欲坠了 (3)。

我们重温了上述蒙古第一次征服西藏的记载，就会发生年代次序上和因果关系上的疑问。为什么1206年成吉思汗甫践汗位就要策划入侵西藏(4)？蒙古同西藏不相毗邻，有唐古特王国西夏(藏人称Mi-nyag)介于其间。虽然当时西藏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何至于一听到入侵的谣传就这样恐惧万分，竟至不放一矢，乖乖地投降？一个巧妙的假设说“……藏人的嗜血凶顽的性格”因佛法的弘传“转化为追求精神上自我满足的热忱”(5)，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之后几百年内西藏历史上还充满了无休止的内战。还有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后藏人就停止入贡，严酷无情的蒙古人怎么会等候了十三年之久才派遣一支讨伐军入藏？

如果这部分一般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对于上面这些问题就很难系统地作出合乎逻辑的答案。不过上面提要所依据的史料已经把西藏误认作成吉思汗最早征伐的国家。成吉思汗当时军事目标是西夏(6)。其时，西藏并没有投降成吉思汗，也没有纳贡于蒙古(7)。到阔端(成吉思汗孙)主管青海之前，没有证据证明蒙古人同藏人之间发生过直接的接触。事实上，1240年多尔达达尔汗的远征才像是这两个民族第一次军事冲突(8)。

为什么阔端派遣蒙古骑兵入藏呢？既然前此西藏并没有投降，所谓1240年远征是一次责问贡赋不入(9)之罪的“惩罚性的袭击”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了。

多尔达达尔汗军事行动规模之有限，次年蒙古人之不告而走，使有人断言，蒙古人来到西藏不过为了抢掠。一个近年的研究成果说这几次攻击的目的“……不在于领土的征服，而是觊觎西藏寺院里积聚的财富”(10)。然而事实上蒙古人所攻击的不过是两个寺院中心(即便这两个中心，据说藉蒙古人之助也修复了)，这个断语就很难说得通了。据说蒙古人没有攻击达垅寺(Stag-lung)，因为当时寺院“被雾气笼罩”(11)，而止贡寺，可以说是最富的寺院之

一，其住持施展法术，“骤然空降一降神兵”⁽¹²⁾，竟幸免于蒙古人的践踏。暂时不说蒙古人素负在异国土地上侦察敌情本领和肆无忌惮的蹂躏的名声，如说他们首要目的是“抢掠”，区区“雾气”或“神秘的花招”居然能够在西藏挫败他们，这似乎太不可能。

按不同的教派以区别1240年之役所殃及的寺院，诚然不免浅薄之谓。尽管如此，这些寺院所依属的教派，歧别为二，可以指明一个迄今被忽视的政治因素。热振⁽¹³⁾、杰拉康⁽¹⁴⁾这两个受到蒙古人攻击的寺院中心，当时都属于革新了的噶丹派（Bka'-gdams），而幸免于厄的达垅寺和止贡寺，则属于半改革了的噶举派（Bka'-brgyub）。如果说出于某些不明的动机，蒙古人只攻击噶丹派中心，这能言之成理吗？当时蒙古人还没有改信喇嘛教；因此就他们说，攻击目标的选择不应归之于教派的门户之见。当一旦注意到西藏各寺院集团与蒙古诸统治者之间的施恩受庇护的连系时，我们说革新了的噶丹派多多少少被蒙古人嫌恶，也许不太离奇。止贡、达垅、蔡巴（Tshal-pa）、噶玛（Karma-pa）和帕木竹巴（Phag-mo-gru-pa），都是噶举派的分支，如同独一无二的萨迦派作过的那样，也此时彼时从一位蒙古的统治者那里接受过保护。⁽¹⁵⁾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噶丹派什么时候得到过这样的恩典。1240年遭受攻击的只有噶丹派的两个中心，此后蒙藏施主受施的系统网中只有噶丹派缺一席位，是有其必然的成因呢，还这是出于巧合呢，至今还是个谜，需要进一步探讨。

正因为把1240年的远征叫作“一次惩罚性的袭击”或“一支抢掠财物的特遣队”证据不够，那么，我们要问，这次远征的军事目的究竟何在？只依靠藏文史料，这次远征的目的及其持续时间似乎谜一样地费解；可是，从这时期蒙古战役的全盘格局来观察，则多尔达达尔汗在西藏的军事行动，显然是一个战略布署，立足于长远的抱负、远大的目标之上的计划的一部分。

让我们回顾一下：1227年蒙古征服了邻接西藏北部的西夏。早在1218年高丽已降于成吉思汗，1231年叛。从1126年以来统治了中国北部的女真族国家“金”，1234年覆灭。于是1235年窝阔台可汗(16)召开了一次库利尔台大会，议定征伐高丽、南宋和伏尔加河以西诸国(17)。

窝阔台长子贵由，偕同蒙哥以及其他同族王子，在拔都（成吉思汗孙和金帐汗）的总指挥下，去讨伐俄罗斯和东欧。次子阔端奉命攻打中国西部的四川。第三子，阔出，原被窝阔台指定为可汗继承人，也指挥一支伐宋的军队。

蒙古军队终于横行在高丽国土上，迫使高丽国王1241年再次投降（此次降于窝阔台）。蒙古军队攻击伏尔加河以西诸国获得胜利，在当地肆行血腥的屠杀，见于诸家史书。可是蒙古攻宋诸役却成功不大。阔出在湖广行省1236年阵亡，其所率领的军队最后撤回。阔端先攻下坚城秦州，控制了接连西藏东北部的甘肃的南部地区，然后挥军经陕西，1236年攻入四川西部，遭遇到南宋的坚决的抵抗，阔端不久就撤离四川，回到陕西。1239年驻军青海地区，其军帐设在甘肃的凉州城附近(18)。

蒙古既然从正面攻击南宋不遂，又负有灭宋的重任，于是转而注意西藏（西藏正是南宋西方的屏蔽）。所以在这以前蒙古一直不理睬西藏也就不奇怪了。西藏对于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可以说是一个未知的国土，对于其它邻居来说，也是同样。西藏地形高峻，山岭重迭，没有珍货盈积的盛名，以此商旅不愿涉足，他们一向愿意走那些平坦易行地区的商道，而避开西藏的贫瘠荒原和冰天雪地。蒙古虽然统治西夏已逾十年，然而从来没有从西夏试图穿入邻居的“喇嘛之国”。而横隔西夏与西藏之间的南山山脉峥嵘峭拔，使人望而生畏，适足成为军事行动的天然障碍。到阔端统治青海地区时，从东北一条进入西藏的不太艰险的道路才能通行，因此说1240

年这年标志着蒙古第一次远征入藏是合乎逻辑的。

应该提一下，成吉思汗及其后继人的习惯做法是在进攻一个新的国家之前就把其首脑召唤来投降，继之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¹⁹⁾。阔端对西藏几乎没有按照这套办法做，理由简单，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统治全藏的名王。在要求西藏投降之前，阔端想来必会采取一些步骤以确定西藏政体的特性如何、其首领为谁。可以想像，他也会要求一个从发兵入侵的角度上做出的对西藏潜力的估价。就未来蒙古从藏区进攻南宋的军力调动来说，这个估价可能是一份极重要的情报。所以，从当时周围条件来看，1240年远征的主要目标是侦察。而阔端本人不领导这次远征也为这个看法增加了理由。大汗以及王室系统内的王子们亲自指挥作战似乎是一个无例外的规则，阔端本人就亲征金、宋；可是这次他把入侵西藏的统帅权竟交给一个无名的将军多尔达达尔汗⁽²⁰⁾！

如果说侦察是阔端的目的，那么多尔达达尔汗在藏用兵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虽然作战时间不长，这位蒙古将军却了解到西藏在政治上已经是四分五裂，世俗领主和宗教首领竞逐雄长，看来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更谈不上布置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至于西藏政治和宗教的诸中心是哪些，地方首领是谁等等，当他返回青海地区时，想必已了然于胸。

在藏文史料中虽然未加解释，次年蒙古人的突然撤离，现在看来，也不是那样神秘了。1240年远征的中辍，其缘起与导致蒙古从东欧屡胜中突然撤退的事件无疑是一回事。这就是1241年12月窝阔台可汗的殒落。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在3月其父患病时正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征战，奉召返回蒙古，途中始悉其父病逝的消息⁽²¹⁾。窝阔台的次子阔端想必同时也被召回蒙古。可以设想，阔端离青海去和林时就命令多尔达达尔汗从西藏撤退。窝阔台侄、金

蒙汗拔都集合在欧洲征伐中的蒙古军队撤至伏尔加河(22)。所以窝阔台可汗的病逝使从西藏伸展及匈牙利的各个战场上的蒙古战争机器，霎时停顿。

有些史料说阔端皇子派遣多尔达达尔汗进藏去寻觅一位有学问的喇嘛来蒙古人中传布佛教。这一类宗教解释不外是后世“撰述历史的喇嘛们”的编造。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可汗虽然都对于其它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本人仍然虔信蒙古的萨满教(23)。窝阔台之妻，贵由、阔端之生母，脱列哥那(Töregene)本人信仰景教。1241年窝阔台死后发生了一场长时间的关于汗位继承问题的争论，脱列哥那在这以后几年中摄理国事，而景教在王室中继续发挥作用，即便1246年其子贵由继汗位后还是如此(24)。鉴于这些情况，脱列哥那之子阔端单纯为了一位给蒙古人介绍新的宗教的喇嘛而入侵西藏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说多尔达达尔汗奉命寻觅一位“统治者”来办理西藏投降事宜，就不太有什么可疑的了。根据多尔达的报告，阔端必定了解到，由于西藏统治权力极端分散，“投降”与其说是政治现实，无宁说是象征性的举动。此外，利用宗教首脑来压制世俗领主以达到臣伏异族的目的，是一个社会学的模式，蒙古人对此并不陌生(25)。所以当时西藏社会既已陷于分裂和对立的状态，阔端从中要选一个喇嘛而不选俗人办理西藏投降事宜，是合乎情理的。

1244年一支蒙古骑兵又来西藏中部。这次没有杀人破坏，倒是替阔端皇子来“召请”萨班。当时噶举派喇嘛中有人声名显赫，阔端反而选中一个萨迦派喇嘛，这是什么缘故？藏文史料说在西藏喇嘛中唯独萨班在宗教学识上最为卓越，他精通梵文，在印度辩胜外道，还会“治病”有妙手回春之誉(26)，据这样的宗教记述，阔端选择了萨班是极自然的。但事实果然如此吗？

近日一个研究结果说多尔达达尔汗……“碰到许多宗派，它们

竟相交结蒙古，以便消灭各自的政敌(27)”，事实与此相反，看来，宗教首脑们最初倒是讨厌同蒙古人发生什么关系。一个材料说止贡寺住持是首先同蒙古人发生接触的，可是他玩弄了一个花招，劝说蒙古人听信了他的话去延请萨班(28)。又说1244年萨班及其二侄被请来止贡，止贡赠送了礼物，打发他们去青海阔端的营帐(29)。

(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止贡喇嘛倒是有些伎俩把萨迦喇嘛“骗送”给蒙古人，几十年后止贡万户决意反抗蒙古人扶植的萨迦代理政权，反而显得最初这一诡计弄巧成拙了。)

所谓“召请”萨班，其实是下一道最后通牒，倘若萨班拒不应召前来归降，就用军事报复手段威胁(30)。而阔端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萨班喇嘛，这个问题必定关系蒙古在萨班身上所寄托的厚望——希望他能够扮演一名把国家拱手让人的统治者的角色。而且这样的角色实际上应该履行合同，长期扮演，不好只上台一夜，就告收场；这样看来，政权统治的连续性将是第一等因素。在这方面萨班堪称上选。其它若干教派首领是从一个僧院组织的共同体中选出担任职务的，萨班则不然，他的宗教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萨迦派的宗教和经济权力，从一开始，就由款氏(’Khon)独家掌握，他们据萨迦寺住持一席统治称尊(31)。萨迦派统治权控制在一个家族手里并在这家族内部传袭，这就为蒙古提供了可行的手段，以利用来保证西藏服属的连续性(32)。

与此有关的事实是萨班携二侄去青海地区。新的看法是“萨班携带二侄意图是想发挥萨迦在蒙古王廷中的影响，即便萨班死了，影响还能继续下去(33)，”恰恰相反，看来萨班被迫出此一举，别无选择余地。八思巴(1235—1280)和恰那多吉(1239—1267)，是萨班幼弟桑擦(Zangs-tsha)之子。桑擦死在1239年，曾娶五妇，生数子，八思巴和恰那二子即长妇所生(34)。八思巴居长，以此是萨迦派衣钵的承继人，恰那多吉则注定要作昆氏家长。1244年奉阔

端召时，萨班（1182—1251）已六十二岁；二侄方幼，八思巴九岁，恰那五岁，此二侄是萨迦统治家族下一代的领袖人物，由此可见，蒙古人之索取他们是打算留作萨班死后的人质，以此保证西藏归附的持续性。又，据史言，恰那多吉曾奉阔端命，娶阔端一女，这样就把萨班的命运同蒙古人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了（35）。

萨班1246年到达青海地区。阔端去和林参加选举其兄贵由为大汗的会议后，1247年返回。传统说法是，萨迦喇嘛为阔端说法，阔端授予萨班以蒙古名义统治西藏的世俗政治的权力，于是萨班写了一封长信，给当地领主们和喇嘛们，教谕他们投诚纳款，因为抵抗蒙台军队是徒劳无用的（36）。虽然这封信上含有威胁语调，看来它在西藏政局上并没有发生可以感觉到的冲击。从来不见记录提到当地对强加的蒙古人的统治有过反抗，也没有关于纳贡的翔实记载（37）。从劝降书的发出到1251年萨班之卒这段时间诸如此类的事情，藏文史料中确未涉及。文献上的沉默也许预示此时正值蒙古宫廷中再次虚位。1248年，贵由正准备打他的堂兄弟金帐汗拔都（拔都曾反对贵由为汗）时，突然去世（38）。堂兄弟诸王之间敌对冲突爆发，蒙古人全神贯注于汗位的继承问题，一时似把西藏事务搁在一边了。

《年表》(Re' u-mig) 记载萨班和阔端都死于铁猪年（1251）（39）。但另外史料则记录1251年以后与阔端有关的历史事件（40）。或许《年表》一书作者设想阔端之兄贵由死后，阔端没有践大汗位，以故前此已与人世永诀。事实不然，拖雷长子蒙哥在1251年被推举为大汗主要由于拔都的一系列的的活动——拔都激烈反对窝阔台这一房（贵由、阔端属于此房）。拔都和蒙哥有双重家庭联系，不但他们的父亲是兄弟，而且他们的母亲也是姐妹。因强力造成的汗位继承上的这一转换导致亲属王公间多年的敌对行动，一方继续支持窝阔台系，另一方则依附拖雷系，双方各自效忠其主，结果破坏了蒙古的

和协，其损害之严重情况，详其他书，此不赘述(41)。

蒙哥被选为汗，即再次兴兵讨伐西藏，近人研究藏史对这些战役的意义，评价颇为悬殊。有些人主张1251年蒙古入藏是因为这年萨班一死藏人停止纳贡(42)。另外的人则说蒙哥调一支军队在1251——1252年进藏“……为了正式占领此国”(43)。藏文史料则谈到蒙古在1252年曾攻打一地，地名记如，“西藏之mon-mkhar-mgon-po-gdong”(44)。尽管近人研究成果断言这是一次征服之战，诸史料中均不见实证，使人对于蒙古在西藏本部的行动范围的大小不能不发生疑问。实际上，我们可以指出，汉文史料于当时蒙古在其周围地域的征伐莫不涉及，唯独这时所谓蒙古入侵西藏中部一事却是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史书明记蒙古诸次大战役，从无暧昧之处。1252年库利尔台大会决定讨伐高丽、波斯和泰族的王国南诏——南诏当时是南宋西南的屏藩(45)。一将奉命伐高丽，1256年高丽国王躬谒蒙哥可汗牙帐请降(46)。蒙哥之弟旭烈兀奉命行军波斯以征服Nizari亦思马因派——伊斯兰教派的分支通称“刺客”(Assassins)。1256年旭烈兀军功告成，使他得以1256年在波斯建立伊儿汗朝(47)。

与此同时，蒙哥命令另一个弟弟忽必烈统军伐南诏并赐之以包括甘肃南部巩昌府在内的地方。巩昌府一地，自1235年阔端取自金人之手以来，一直是阔端的青海领地的一部分；它被蒙哥赐于忽必烈则标志着青海地区的统治权从窝阔台子孙转移至拖雷子孙之手。

且不谈其它若干相互抵触之处，史料咸称，次年(1253)是忽必烈汗首晤八思巴喇嘛之年(48)。大概忽必烈为了表明他当时已是阔端领地的主人，派遣骑兵到阔端营地索取萨迦喇嘛，因萨迦喇嘛就是西藏降服的象征。据云忽必烈原意找萨班本人；不意此时这位精通五明的上人已奄然物化，所以遣去的骑兵就带回来萨班之侄八思巴(49)。萨迦喇嘛一旦转移于拖雷系王子忽必烈之手，阔端皇子

似乎就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50)。

据《年表》云，忽必烈乃授予八思巴以掌管西藏十三万户的行政大权，时为1253年 (51)。其实这是纪年上的谬误。西藏之分为十三万户是此后的事态发展的结果 (见下)。如果二人晤面时确有封授之举，那可能不过是形式上的做做姿态，再次肯定阔端1247年给予萨班的象征性的权力而已。

水牛年 (1253) 或许因发生另一重大事件而著名，此即蒙古人讨伐傣族所建的南诏王国。据云忽必烈1253年集结军队于陕西，军队经过四川，攻击位于南宋西南边陲的南诏首都——大理。忽必烈慑之以兵威，此城遂不血刃而下。次年忽必烈留一将镇守，回军北上，与其兄蒙哥会合 (52)。看来忽必烈伐南诏的行军路线经过原属中国的地带。可是某些人研究结果却主张当这场战争过程中，蒙古的铁骑已践踏西藏东部土地；另外的人则断言西藏本土的真正的征服也毕功于此役 (53)，晚近一本书还说蒙哥可汗“……1253年派遣一支武装力量进入西藏，西藏于是并入元帝国，从此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54)。对照历史条件，这一说法似乎是政治上的敷衍门面话。蒙古人确有可能在中国的西部遇到某些藏人土著，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军队到达西藏本部。

历史材料关于蒙古征伐南诏期间八思巴的行踪没有记载。在这场战役中忽必烈是否携带八思巴，用作一个傀儡以号召沿途所遇的藏人土著呢？大概不是这样，因为当时萨迦派的影响还未远播，萨迦派在西藏东部广泛传布，是后来的事情。其实，可以设想忽必烈所遇到的那些藏人的居住地区，盛行的极可能是根柢坚固的原始宗教——苯教 (55)。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觅得西藏东部占优势的宗教界里某个喇嘛，岂不是蒙古人更可能的选择么。

日后藏族传说描绘了一幅忽必烈与八思巴初次会面时，忽必烈虔诚敬奉八思巴的图画，强调二人结成的一种连系“……如穹苍上

的日月”，结成 yon-mchod 关系 (56)。yon-mchod 是一个缩写词，由 yon-bdag 和 mchod-gnas 组成。yon-bdag，指“供养一位宗教人物或宗教对象的人”，换句话说，即功德主或施主；mchod-gnas，指“宗教施舍物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接受者”，也就是一位喇嘛，在政治所限定的 yon-mchod 关系里，施主提供军事力量使喇嘛所获得的世俗的特权，藉以生效，喇嘛则应施主的需要，专诚做法事以酬报施主 (57)。虽然后日“编纂历史的喇嘛”把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誉为一个无比虔诚的 yon-mchod 范例，可是他们所缔结的关系，至少开头时，纯粹是“统治者”和“属民”的关系。

这里且不谈藏人的传说，我们实在找不到理由解释为什么忽必烈一见八思巴就为之倾倒。当时景教还如窝阔台及贵由时代那样，在蒙古王室中起着影响。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和帖尼 (Sorghaghtani) 就信仰景教，据研究，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也是一位景教徒 (58)。忽必烈似乎继续信仰蒙古的萨满教，并且与蒙哥相似，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人们说忽必烈信仰了西藏佛教，但这是以后的事情。

即便忽必烈确实曾经对西藏佛教感兴趣，看来，在他与八思巴缔交的最初阶段，八思巴喇嘛并没有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果忽必烈派遣军队到窝阔台营帐，本想迎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老萨班，待他见到骑兵带回的却是萨班的十几岁的侄儿时，也未必热情吧。他从南诏远征回来，延请了西藏另一位噶玛派黑帽喇嘛噶玛拔希 (Karma Bakshi) 来到驻地，他早时对待八思巴喇嘛的情感冲突可能因此更加激烈。1255年忽必烈晤见了噶玛派喇嘛 (59)。当时噶玛拔希将近五十岁，忽必烈曾经促请他留居左右，想来噶玛拔希在世故人情方面的谙练，宗教经验的丰富，给四十岁的忽必烈很深的印象。可是，噶玛拔希谢绝了，并继续他的旅行，次年到达和林蒙哥可汗的王庭。据云他曾使蒙哥从景教改信西藏佛教 (60)。迨1260年忽必烈践大汗正，噶玛派不能得到蒙古人的保护，可以从噶玛拔希

拒绝留下一事得到解释。

1256年忽必烈建立宫室于开平府，此地通称上都（即科勒瑞治〔Coleridge〕“忽必烈汗”一诗中的Xanadu）⁽⁶¹⁾。他从这里出发会合其兄蒙哥共同伐宋。次年，蒙哥汗在战地患热病死去⁽⁶²⁾。继之出现了争夺汗位的王室间的胎害至深的抗争。

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举行的一次库利尔台大会上称帝⁽⁶³⁾。他似乎解决了早时对待萨迦喇嘛的心理矛盾，因为同年他尊八思巴为首席喇嘛，赐予“国师”封号⁽⁶⁴⁾。

忽必烈被选为可汗一事无可挽回地带来王室内部的冲突。早在蒙哥南下伐宋时，曾命令其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蒙哥死后，在1260年以前，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了一次库利尔台大会，会上宣布即可汗位⁽⁶⁵⁾。于是兄弟间竞夺汗位，进行流血战争，最后1264年以阿里不哥降于忽必烈结束⁽⁶⁶⁾。阿里不哥的败降以及两年以后1266年他的去世，并没有消除了争权夺位的充满血腥的积仇宿恨。

并不是所有蒙古王子们都承认忽必烈（拖雷之子）为可汗。在持不同意见者中最卓著的是海都汗，他是窝阔台之孙⁽⁶⁷⁾。海都同另外一些王子们——尤其同察合台系王子，在河中（Transoxiana）建立自己的汗国。1265年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库利尔台大会，海都被默认为中央亚细亚蒙古的大汗⁽⁶⁸⁾。这两位可汗对抗的激化，把蒙古人分为两派，长达数十年，到忽必烈、海都这两首脑去世，始告结束。十三世纪下半叶海都加给忽必烈的军事威胁，可以用来从根本上说明当时西藏的事态。

1265年，藏历木牛年，八思巴喇嘛回到萨迦，这是他1244年离乡后第一次回来。很奇怪，这次远行竟在近年的历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提到时不过附带一笔“……1264年短暂回家一次”⁽⁶⁹⁾，有的完全不提起⁽⁷⁰⁾。甚至《年表》叙述此事也轻轻带过，简单地说到1265年八思巴返藏，1269年复去蒙古地方，没有记

下任何八思巴滞留萨迦时的事情(71)。可是，我们把表面上的个别的孤立的事件放在一个囊括一切的因果关系的格局内来观察，则这次八思巴“返藏”呈现极端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蒙古在西藏强制行使其威权的最初步骤就开始在八思巴第一次返萨迦时，这就是本文所愿提出并论证之点。

除去上述1252年蒙古攻打地望不详的 Mon-mkhar-mgon-po-gdong 事件，八思巴离开萨迦后二十多年之内(1244—1265)，似无材料证明蒙古军队曾到西藏中部。在这时期，蒙古因向外扩张征服和内部成吉思汗的诸子的后裔间的复仇战争，劳瘁精神于干戈之事。至如西藏，地形高峻，难于攻取，又被若干领主、喇嘛所割据，政治上四分五裂，对于蒙古还构不成军事威胁，所以蒙古完全置之度外。正因为这样，1265年八思巴喇嘛第一次返回萨迦切不可当作区区偶然事件而等闲视之。

据传说，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缔结“施主—受施喇嘛”的关系的同时，八思巴就接受了统治西藏的世俗权力。然而这时忽必烈不过是“许多王子中的一个。”直到他的兄弟，也即他的对头，阿里不哥在1274年被监禁，忽必烈才成为无可争辩的可汗（至少在东部蒙古中如此），也在这时，才转移其注意力于西藏，得以凭藉武力把八思巴的“象征性的授权”变为具体的政治现实。

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265年忽必烈汗派了一个骑兵兵团护送八思巴及其幼弟恰那多吉入藏，强迫当地领主们和喇嘛们老实地接受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的建立。与这个设想有关的记事见于《红史》(Deb-ther dmar-po) 中一个关于恰那多吉的可疑的叙述。恰那多吉同阔端一女联姻以后其幸福与否和居住何地，史料中从无记载，这时，出乎意料，史言忽必烈汗任命他为西藏的首脑(72)。虽然不记年月，由情况可以推知，这一任命颁发于八思巴出发去萨迦之时。尽管八思巴接受了统治全藏的世俗权力，作为忽必烈的精神导师，